

# 文本建构过程的竞争：行动者、关系和制度

## ——转型经济中的“地方社会”模型

（以温州“农民建镇”为例）

周 怡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摘要** 只要不是亲历的事件，该事件的真相及其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就是文本的作为。本研究通过既往文本的比较，在收集一手田野资料基础上以充分“深描”的方式，探讨1980年代发生在温州“中国农民第一城”的建镇事实及其文本建构过程的竞争抑或冲突。围绕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制度三个层面，研究建构了一个“地方社会”（关系）模型，其基本结论是：发生在改革年代的一个曾经被文本喻作“自下而上”的农民建镇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仍然镶嵌着“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与发动，依然是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权力制度干预的结果。因为：（1）参与其间的行动者是政府官员、地方精英和农民的集合体；（2）地方政府与农民间存在的双向庇护或相互依存关系构成行动者之间的强关系结构；（3）地方政府对来自民间的非正式制度的吸纳贯穿于建镇过程的始终。

**关键词** 地方社会模型 文本 行动者 关系 制度

### 一、研究问题

介入到温州苍南“龙港”建镇的研究是一机缘，也有一份自然。2007年7月当我和学生们结束一次温州调查在机场候机时，我的手机里传来了一位陌生老者急切需要与我交谈的请求。我答应见他，8月只身再去温州时，于龙港镇同三位当年的镇干部做了3—4小时的集体访谈，话题自然围绕“农民第一城”的建镇。他们主动约我谈的目的是想告诉我：作为文本的《龙港镇志》对建镇历史的描述并非真实（陈君球等，2000）。在他们的口述及其纪实中，“龙港的建镇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创业史。”（陈君球等，2000:1）显然，这与20多年前，“一群农民带着资金和户口，在鳌江入海口的那片荒滩上造了一座‘农民城’。

龙港因此成为中国农民的一个改革创举，成为农民自发参与城市化进程的一个象征”（王汝亮，1994；陈文苞，2007）所表达的文本语境以及这类文本所赋予的符号意义完全不同。用涂尔干的话语来说，建镇事件作为一个社会事实（social fact），本身有其客观不变的大量经验数据和资料，它不会自己陈述真相，诠释者的陈述是文本语境产生作用的关键。

姑且不关心上述两种文本的孰是孰非，最先也是最直接引起我研究兴趣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两种文本提供的行动主体不同，将导致两种不同的理论关怀：（1）如果行动主体为农民，农民们“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建镇、走城市化道路的实践无疑与后毛泽东时代出现“市民社会模式”抑或“市场体制”相呼应。（2）如果行动主体是党领导的国家政府，政府动员下的建镇事实则与后毛时代承继毛时代“革命模式”抑或“再分配体制”相关联。二是，两文本的提供者皆为地方政府官员，他们直接参与了建镇并先后拥有乡镇权力的最高位置。这提醒我注意到，或许即使在率先走入市场经济、私有化程度最高的温州，事实文本的话语权依旧在政府掌权者手中，并且文本的建构过程明显存有权力竞争。

沿这些思索本研究欲提出的中心论点为：温州“农民第一城”的建镇过程印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社会”（local society）的生命力，而非是外在于国家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崛起。

## 二、地方社会模型：综述与建构

何为“地方社会”？既有的文献并没给出明确的学理定义，仅有作为地理涵义的泛泛指涉的使用<sup>1</sup>。本文中的“地方社会”，是介乎于“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行政分析单位，既区别于国家政府领

---

<sup>1</sup> 比如，港台学者经常在有关中国人的关系研究中用到“地方社会”。

导下的大一统社会，也不同于西方民主—自由理念下的市民社会；但它与国家与市民社会密切联系。因而，我们不妨从若干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摄取本文“地方社会”模型所指称的涵义。

在传统意义上，市民社会是指与国家相对、独立于或部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契约的自主性社团或领域。这种观点源于 18 世纪反对专制主义的学说，它视市民社会是先于国家（Hobbes, 1994; Locke, 1980），外在于国家、外在于政治的自主领域（Bell, 1999; Ferguson, 1966; Taylor, 1991; 黑格尔，1982）。比如，Tismaneau 将市民社会看作是“脱离政府控制的反组织结构”（Tismaneau, 1990:17）；Walze 等构想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特的行动体，作为一个潜在的社会自主性领域，作为“没有专制的人类社团和一套相互关联占据空间的网络”而存在（Walzer, 1992: 89; Axtmann, 1996:77; Cohen & Arato 1992）；Bell 呼吁复兴市民社会，以此可以抵御日益扩张的国家科层制（Bell, 1999）；而在重农学派的叙述里，市民社会被勾画为一种“经济体”图景，即认为它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总和”（邓正来 & Alexander, 2005: 18）。

与传统的强调市民社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政治的观点不同，孟德斯鸠、黑格尔和托克维尔在谈及市民社会话题时并没有丢弃国家抑或政治。比如，孟德斯鸠界定的市民社会是存在于政治体系的多个层面上的具有“中间团体”、“两栖实体”性质的概念，既拥有外在于政治结构的生命，又在政治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不再由政治结构来界定，它是市场，是通过市场经济这一高度自律的模式来规定的社会。它“是独立的私域，但却不自足”，因而为维持“市民性”需要“诉诸一个外在的最高的公共机构，即国家”（黑格尔，1982；邓正

来& Alexander, 2005:88-90);托克维尔论及美国民主时指出,美国是完全的市民社会,因为社会充斥着大量的结社和自愿性组织,市民关系中的市民性相当明显(Orum, 2001)。但这些自治的市民团体,被建立在与分权制度相联系的政治体系的多层面上,以使其自治不仅在全国范围也可以发生在地方层面(邓正来&Alexander, 2005:28)。

以上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探讨,最终是求揭示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界限以及其交织,从而界说市民社会在观念上与现实上的可能形态:(1)与国家的分离性;(2)彰显市民性;(3)与市场经济的亲合性。如果这三种可能形态被归纳为本文意向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话,那么,我们的有关“地方社会模型”的界说就出自西方人对转型中国是否出现市民社会的一组争论。

东欧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被归为摆脱集权式的国家统治而走市场化、私有化道路的转型,曾一度推动了市民社会理念的复兴。1980年代起,当中国作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起步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关心:市场转型期中国是否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出现市民社会的迹象?

围绕这一问题的论争基本分为两路:一是着重从史学角度在国家与社会两分观框架下所做的汉学研究(Chamberlain, 2003; Rankin,1990; Rowe, 1984,1989; Wakeman, 1991;Huang,2003);二是着重当下的在转型理论的争论中所做的实证经验研究(Lin, 1995; Oi, 1986,1989,1992,1999; Peng, 2001; Walder,1995; Yang,1989)。两路视角不同、方法差异的研究,最终得出的观点却较为一致:即市民社会的概念与中国少有甚或没有关联,因为在中国尤其当代中国的研究中,我们只能“一遍遍地将‘国家拉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我们需要把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拉到靠近国家或政府的领域”(Chamberlain, 2003: 253)。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赞

同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之间考虑使用中介变量，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转型实践。如魏斐德、兰金、赵文词等曾经不同程度地转向用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三分概念来看中国。

又如，黄宗智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一文中提出，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型不适合中国的近现代实践，“我们需要转向采用一种三分的观念，这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third realm）”。这个第三领域从清代、民国再到当代的不同时期都始终存在着，并且“随时间的变化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制度形式”（黄宗智，2003:260）。

再如，戴慕珍 1986 年提到的“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概念就反映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参与。她明确指出中国制度转型了，不意味政府官员权力的削弱或被转向普通市民，而意味着上层权力下嫁到了低一层官员手里——再分配权力被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在农村：（1）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80 年代，地方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包干合同、为集体企业提供生产和行政服务等控制手法，直接领导发展地方集体经济，并在其管辖范围内继续实施再分配举措。90 年代以来，农村私营企业逐渐崛起，地方政府继而将权力转向限制私营业走向独立经济实体方面，造成私人企业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之中，地方政府官员也可藉由提供资源兼演私营企业家的角色。（2）村庄政治是一种精英—农民之间的庇护主义政治。人民公社时期，“村庄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却是国家的代理人。对农民来说，他们代表国家，执行和解释国家政策，控制信息的向上流通。”80 年代分田后，“村庄官员依然是个体农户与国家签订合同的管理者，”“他们与农户间存在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追逐本位利益”（Oi, 1989）。

其实，不管是戴慕珍的“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还是林南的“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local market socialism）、魏昂德的“政府即厂商”等都用社会事实回答了什么是“第三领域”的问题，这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掺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状态。这一状态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普遍且将持续存在于今天的转型中国社会之中（黄宗智，2003）。它的一个推论是，类似西方经验的纯粹市民社会的理想型在中国几乎不存在。

以上综述可为本研究提供的理论思索主要在两点：（1）缘市民社会争论而生的“第三领域”，可能是未来考察中国政治变革关键地带。那么，（2）“第三领域”究竟在哪里？凭实地调查的直觉我们以为，除理论上它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发生场域之外，还应该是一个建构在区域事实上的概念，具有明确区域界限的行政单位。据此本文提出，“地方社会”一词似乎更能统摄抽象理论与实体感观的结合，也便于概念的操作化。具体操作如下。

在学理上，如果借用黄宗智的“国家化”程度与“市民化（社会化）”程度两个纬度作四分框架，我们得出图 1 所示的四象限类型分析概念。I 象限表达“国家化”程度弱而“去国家化”的“市民化”程度高的“市民社会”模型，即外在于国家和政治的市民社会。II 象限呈现“国家化”与“市民化”都弱的个体主义取向的社会模型，相对那种个体投入团结阵线而形成的集体组织的市民社会来说，相对国家控制下的集体主义取向来说，这类型的社会成员呈个体单原子性。III 象限体现强“国家化”与弱“市民化”的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社会模型，中国毛时代再分配占主导的实施“大一统”层层控制的政治社会属于该模型范畴。IV 象限即为本文欲予求证的后毛时代中国特色的“地方社会”（关系）模型，既呈现强程度的“国家化”，也显示强程度（或适度）的“市民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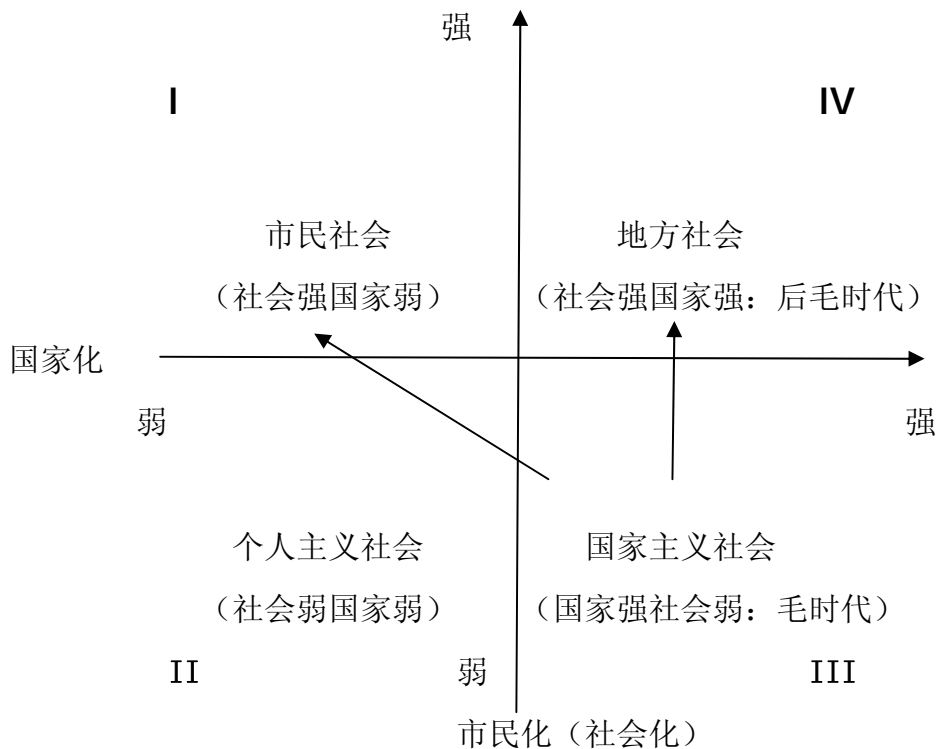


图 1 地方社会模型的建构

进一步地，为理解中国特色的“地方社会（关系）模型”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由III象限向IV象限过渡的动态过程。这是中国社会从毛时代走向后毛时代、政治时代转向经济时代、再分配制度迈向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静态而看，III、IV象限的不同仅在于“市民化”程度的不同：前者为弱，后者为强；“国家化”程度两象限表现出相同的强势。但动态去看，市民化程度由弱变强的根本原因却依赖国家化程度保持强势下的策略性权力转移或分权制度。具体来说，以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毛时代与后毛时代已经分别走过了30年历程。前30年，从建国起中国就急速地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经济上，效仿苏联，“废除市场制度，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协调为特征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政治上，毛泽东依靠其领袖威望建立了在他领导下的全能政府（totalism），“即指运用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便改造和重建社会”（吴敬琏，2003:38）。这阶段，不管是集权的计划经济，还是行政分权的计划经

济<sup>2</sup>，社会统统被管辖在强势的国家权力之下呈“去市民化”状态。后30年，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向地方放权让利的策略由原来的计划再分配逐渐转向了市场取向，由以往单纯的“行政性分权”逐渐转向了“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sup>3</sup>的并举，甚或单一的“经济性分权”。改革最初采取的“财政包干”等权力下放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具有自主权的同时，也“成为一个积极追求地方利益的行动者”（Oi,1992,1995，1998,1999）；在行使以往只为中央政府独揽的权力的同时，也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诸侯经济”现象（吴敬琏，2003）。这种现象使得市场关系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中自然生长，刺激了最初的市场发育及其力量因素，因而市民参与、企业商会行会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发育，带动社会市民化程度明显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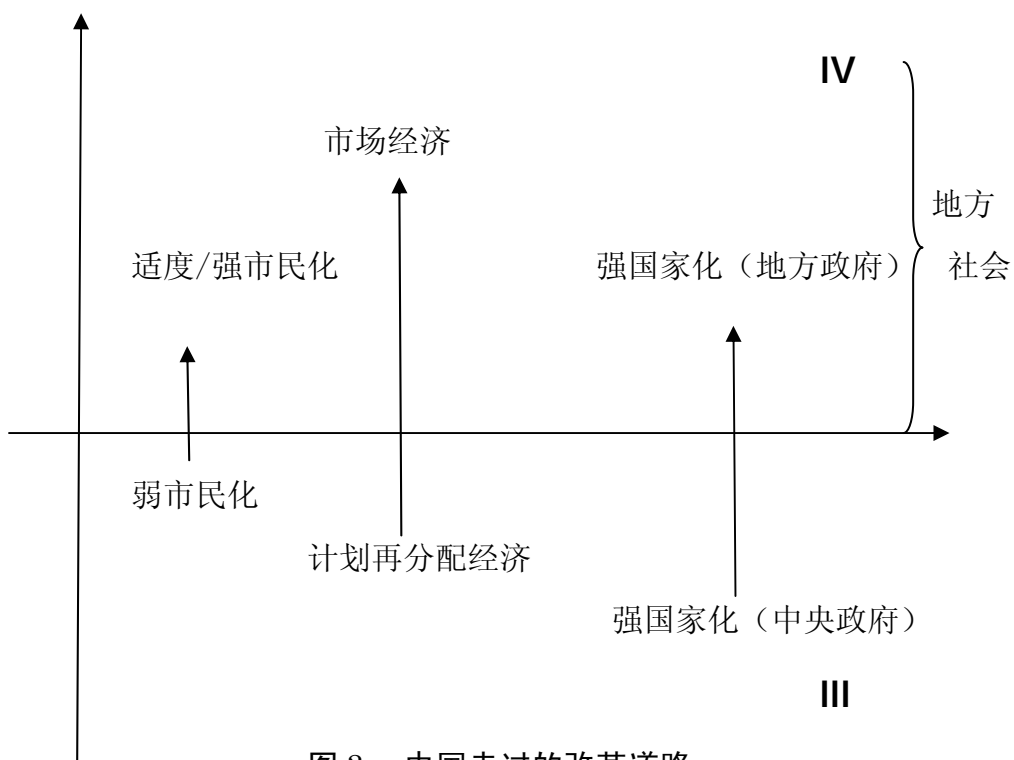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走过的改革道路

<sup>2</sup> 所谓行政分权的计划经济，即只向地方下放计划权力，是保持计划经济框架的分权（吴敬琏，2003）。

<sup>3</sup> 市场取向的分权抑或经济性分权，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分权（同上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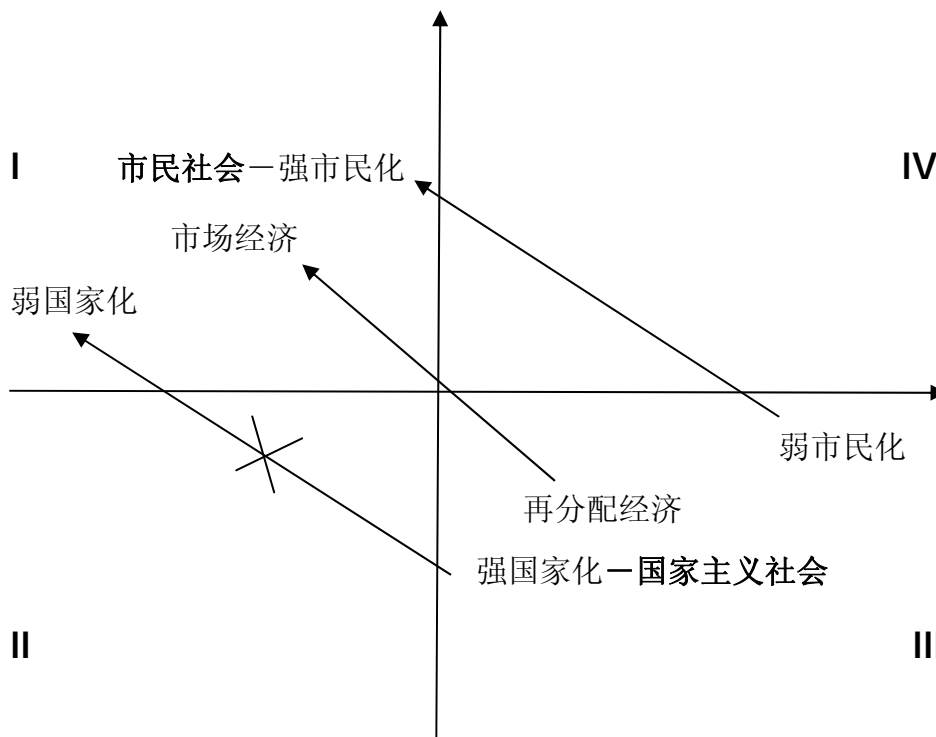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没有走的改革道路

图2显示了中国从毛时代向后毛时代的过渡所走过的改革道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存在我们需要陈述的两个要点：（1）虽然由III到IV,强国家化概念没有改变，但国家化的内涵是变动的，即行使权力的主体（行动者）由中央政府下嫁到地方政府。（2）由III到IV，虽然市民化程度由弱向强处在发育或增长中，但这种强势是适度的，因为它受之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育在再分配经济的基础之上，是政府发动和参与其中的结果。据此，本文的“地方社会模型”，意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个双方都积极参与其间的关系共同体的区域模式。无疑，这一被建构在既往理论综述基础上的地方社会模型中将囊括三大要素：一是行动者，其间包括国家与市民两大行动主体。二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积极参与”意味两大行动主体的互动属于“强关系”<sup>4</sup>互动。

<sup>4</sup> 此处借助 Mark Granovetter 在“弱关系强度”一文中所提的“强关系（strong tie）”概念，意指地方

三是制度，包括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镶嵌；强关系的互动结果是共同体的形成，其形成过程明里是政府与民众的博弈后的团结，实际却可能是非正式制度逐渐被正式制度所接纳的合法化过程。三要素之外，还有一个地域限制条件，即地方社会作为一个“区域模式”，具有地方性地域界限之特征。因而，所谓地方社会模型也被三要素一条件所建构。

图3作为“中国没有走的改革路线”在这里显现的意图，是从一个悖面去诠释“地方模型”的中国特色。我们知道，从III走向I象限的改革路线是东欧以及前苏联剧变后所走的“休克式”改革，也是西方人期待中的中国路线，同时还是倪志伟(V.Nee)预设的“市场转型理论”的理想型，但是中国没有这样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中国人走向市场时始终不愿丢掉国家的领导，即“去国家化”始终没有发生。尽管再分配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尽管中央政府权力分权让利于地方，也尽管民营企业已经迅速增长，但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sup>5</sup>的特征却深深镌刻在中国改革征程上：(1)再分配遗风依旧，“至少在改革的前20年里，中国存在相对的混合经济模式，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依旧控制着地方经济和政治权力”(Oi,1992,1995,1998,1999;周雪光,1999;Peng,2001;Lin,1995,walder,1995)。(2)“革命模式”依旧影响当下，国家的社会动员力量在市场环境中依然发挥作用(Perry,2007,2008)。(3)社会或民间习惯于遵从、合作和被安排，底层阶层无法自救(李昌平,2003)，上层阶层期待政治稳定(Tsai,2007)。基于这些原因解释，中国没有走象限I的市民社会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地方社会模型”存在性，即强国家化的维系。

倘若扫视一下“地方社会模型”的建构基础，就应明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各

---

社会中由地缘、业缘甚或血缘关系结成的关系状态。

<sup>5</sup> 所谓路径依赖，即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作出的选择的范围(North,1990)。

个时期、各个角落和各种事件中其实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模型，因为该模型被建立在众多研究者的实证经验研究的发现之上，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这一中国特色的地方社会模型在全国市场化、私有化程度最高的温州地区是否成立？便是本文关注和需要回答的问题了。下面我们转而讨论温州“第一农民城”建镇实例。

### 三、建镇过程的两种文本

#### （一）研究对象及其文本取向

选择龙港建镇事例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早年“温州模式”作为地方区域经济模式而著称的时候，龙港发生的农民造城运动是其中一盏不可忽略的符号亮点。龙港镇地处温州南部的鳌江入海口南岸，隶属苍南县，土地总面积 80.7 平方公里，人口 34 万，现辖 9 个办事处、23 个居民区、107 个行政村（龙港镇志，1994）。建镇前这里只是 5 个小渔村、3 家小作坊和一片滩涂。鳌江下游南岸的一个小渡口，是农民外出的唯一通道。渡口每日人群穿梭，但“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的民谣反映这块土地的贫瘠。

可是 1980 年代初，在中国刚步入改革开放的经济时代不久，这里发生了两件令人汗颜的大事。一是“农民走私”；二是“农民造城”。在传统的社会价值伦理尺度上，前一件事属于“恶”，是政府加大力度去取缔的事件；后一件事属于“善”，是政府积极投入加以宣传的事件。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地域及其时间上的承继性都使这块地方名声鹊起。尽管人们估猜两事件其实具有某种联系（朱康对，2003），后一件事——农民造城运动——在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上确实留下了足迹。

然而，对这段农民造城历史的描写一直以来存在两类不同的文本：（在理论

语境中，)一类是顺应市场取向的，认为建镇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农民自组织行为，预示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姑且称之为市场派；另一类是持有再分配取向的，将建镇继续视作一个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组织行为，彰显地方权力的作用，被称之为再分配派。在资料的搜索中，我们发现持市场派观点的文本占绝大多数，媒体的报导、意识形态的宣传、学界的理论分析以及温州人引以为豪的表达，几乎一面倒热衷去描述农民自主造城的浪漫话语。再分配派的话语权显得微弱，不成主流，但 30 多年过去，即使在原本矗立在国道路口的“中国农民第一城”牌匾已经被“中国印刷城”取代的今天，在民间这一派仍然孜孜期待着建镇事实的语境发生改变。比较两类文本话语的异同，我们可以从中体悟某些被唤醒的社会共识。

为便于比较，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我们选择 4 部作品作为代表性样本。其中，市场取向、再分配取向的各选两部，各取向中又有一部是出自当地镇干部之手的纪实资料，另一部为学术性研究著作。下文中它们分别被标为 Aj, Ax, Bj, Bx<sup>6</sup>。

## （二）文本话语的比较与分析

### 1 · 作者身份比较

研究地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授名于 1983 年 10 月，1984 年 6 月正式开始筹建，是先授名后发展的城镇。两部纪实作品分别出自先后两任龙港镇政府的一把手党委书记。

Aj 的作者，现年 70 岁，温州苍南钱库人。1984 年 6 月至 1989 年 7 月任龙港镇党委书记，经历了授名后建镇的全部发展过程。建镇之前任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1989 年调离龙港参与苍南具体改委工作，退休后自建某私立高中学校

<sup>6</sup> Aj: 陈定模：“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记温州农民集资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载张连杰编《走进温州》，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参考陈文苞，2007.《陈定模与“中国农民第一城”》，未出版稿。）

Ax: 朱康对，2003.《来自底层的变革：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Bj: 陈君球等，2000.《开发龙港纪实——龙江港区老同志回忆录》，未出版的自印刊物。

Bx: 魏启番主编，2008.《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的由来》，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任校长、董事长。

Bj 的作者，80 岁，苍南龙港人。1982 年 4 月至 1984 年 10 月任龙江港口建设（龙港镇的前身）领导小组组长、港区党委书记，经历的是建镇筹建过程，后于苍南县经贸局任职，体育协会会长。

两任镇政府一把手，虽然早已不在其位，但建镇过程赋予他们心灵的震撼、记忆和悲喜极为强烈。2007 年 8 月我分别与他们各自做过深访。访问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俩 30 多年来一直处在彼此分歧、互相攻击的思想或行动状态，矛盾的根源不在私人恩怨，而在对建镇历史事实的书写竞争中。可以想象，当“农民第一城”成功发展后，Aj 的作者作为当年当红在任的领袖人物，自然要面对众多采访者、访问者侃侃谈这段历史，于是他的名字几乎与这座农民城共荣。而 Bj 的作者却被很少提及或者根本被忽略，他辞官后成为当地积极的地方能人，在直接投入地方经济的同时，不断主动出击式地去重塑这段建镇历史，这就产生了本文开场白所提及的来自老人的电话。事实是，当面对几位质朴而慈祥的老人，怀揣他们自己写成的纪实，认真而执着地向陌生的来者叙述他们的那段奋斗史时，我能够理解：他们不是在为自己争得那份曾经的功臣，而是想以其直接参与者或见证者的身份告示人们，“农民第一城”的建镇历史里从一开始就凝聚着地方政府官员的心血和投入。

其实，就两位书写者身份而言，地方政府官员作为当年积极的行动者其参与、组织或指挥建镇的事实已然明确。需要留意他们写成的不同纪实，所牵涉的并不单是叙述上的分歧，不单意涵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存在权力利益的矛盾，而更是具体路线的争论与竞争：年长者（Bj）倾向传统，强调国家再分配权力延续；较年轻者（Aj）倾向改革，宣传市场的平民精神。

## 2 · 主导词比较

大凡文本其开篇总是“开门见山”直触主题的。主导词不同，文本所传达的事件信息、语境、意义诠释就不尽相同。

Aj: 从1984年4月开始，苍南县农民在鳌江河口五个小渔村和一片滩涂的基础上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p. 1)。

Ax: 龙港，这座依靠群众集资，仅用几年时间奇迹般地在一片荒滩上矗立起来的新城，是龙港人民的杰作，也昭示了当代农民伟大的力量(p. 1)。

我们从中获得的是：

行动主体	农民
事件语境	农民建镇
意义诠释	改革初期农民自下而上走城市化道路

于是，人们读到的学界声音是中国第一个“市民社会”的诞生：

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 city 而言，大陆中国严格地讲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这个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唯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像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庄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 city 一样。

(秦晖，1999:19)

可是，B文本的主导词这样：

Bj: 1982年春，受中共苍南县委派遣，我们一行四十人从事龙港的开发，……在一片空白的地方创建城镇，谈何容易，靠的是苍南县委的开拓精神，省市领导的坚决支持，港区开发者的艰苦创业，县府有关部门和县属企业的大力工作，以及当地干部，农民的热情支持……。龙港的建镇历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创业史(p. 1)。

Bx:……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龙港神速崛起的前提和推动力；党的坚强领导是龙港建镇的关键；农民高昂的积极性是龙港神速崛起的基础(Pp1-2)。

我们从中获知：

行动主体	地方政府，农民
事件语境	地方政府组织下的农民建镇
意义诠释	转型期地方政府仍保有自上而下发动民众的力量。

学界的声同“再分配权力维系”、“中国不存在市民社会”等议论一致。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实践，尽管中国有迅速的经济增长，庞大的民营经济，但中国共产党保持它的权威主义。中国的私营业主和民间没有民主的需求。即便在温州其制度变迁也是与体制持久共存的。

(Tsai, Kellee S. 2007:17)

因而，两类文本主导语的差异十分明显：在行动主体上 A 文本为农民，B 文本是地方政府和农民；A 文本的事件语境是“农民造城”，B 文本则为地方政府的所为；A 文本传达的文化意涵是农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行动，B 文本则是政府官员自上而下的组织行动。这些差异所触发的理论思考迥异。

### 3. 建镇时间比较

在建镇起始时间的表述上，A 类文本都以 1984 年 6 月某镇委书记走马上任的日子作为龙港建镇的起点；B 类文本则以 1982 年 4 月县委县政府作出建设苍南县经济中心的决策，成立“龙江港区”为建镇之源头。二年之差，为何 A 文本回避 1982-1984 年的历史？由龙港“大事记”知：

1981 年 6 月 18 日，国务院下达《关于浙江省设立苍南县的批复》，批准设立苍南县。今原龙港镇地属之；

1982 年 1 月 12 日，经苍南县人民政府批准，龙江<sup>7</sup>码头建社指挥部建立；

1982 年 4 月 9 日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苍南县龙江港区；

1982 年 9 月 23 日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龙江港区总体规划》，性质为苍南

<sup>7</sup> 龙港由原“龙江港区”得名。

县物资集散中心；

1983年10月1日龙江港区举办首届物资交流会，吸引周边乡镇10万人参加。仅苍南县有关公司统计，营业额达260万。

1983年10月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批复同意建立龙港镇，为县直属镇。

1984年1月12日，龙港镇工商所暨龙港工商检查站成立。

1984年3月中旬，中共龙港镇委、镇人民政府正式组成。

(龙港镇志编纂委员会，2003：5)

被文本A忽略的两年(1982-1984)恰是龙港建镇的重要筹建阶段，这时期的行动主体是地方政府。

#### 4. 原因比较

就建镇事实的发起原因而言，A文本着重在对当地民间文化与农民心理动机的表述。农民自发而共同契入的“走私”经济活动构成这块土地可以作为市场集镇的最初凭依；渴望成为城市人、过城市生活被解释为农民自组织走城市化道路的本质动力。

龙港建镇及其发展与当地农民的工商业文化传统相联系。在城乡二元分割下，尽管国家对农民从事工商活动的制约从未放松，但为生存，这里农民的非法市场化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生在QQ林家院的走私市场的盛况以及走私活动给村民带来的利润，为龙港建镇过程的农民准备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镇后，林家院有400多户迁进了龙港农民城。

Ax:28-29

群众听说可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龙港落户，好比在农村与城镇隔离这堵铜墙铁壁间开了缺口，农民深受30多年城乡隔离之苦，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跳出“农门”的愿望可以实现了。谁不想成为“一等公民”的城市人呢？一时“龙港旋风”席卷温州……。能不能进龙港，成为周边地区农民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财富、社会地位的标志。

Aj:313

B文本则不同，它对建镇原因的解释重在地方行政划分、政府规划、国营商



业公司主办的物资交流会层面上的先期准备。

1981年6月由国务院、浙江省政府批文的平阳、苍南分县、经济中心的选址以及建立沿江港区是为日后龙港建镇采取的权宜之计。

(Bj:24-26)

建镇前，沿江港区建设领导小组编制的港区总体规划(具体见 Bx. Pp. 53-57)，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纲要性课题，因为它使今后的城镇建设规模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合法的科学依据。

(Bj:47)

为了显示港区的经济效益，吸引农民进港，港区领导决定，1983年10月1日举办首届物资交流会。三天的交流，参加人数达10万人以上，营业额达200多万元。国营商业公司尝到了甜头，广大农民亲眼看到了实惠……。交流会实际是一次加快城镇建设的动员大会。

(Bx:20)

### 5. 政府作为比较

论及政府作为的时候，两类文本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别。

A 文本着重叙说某领袖人物的作为：

1984年6月，中共苍南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由龙港镇委书记带领8名干部6000元开办费，到这个荒僻的渔村进行建镇的筹建工作。

(《龙港镇志》，转引自 Bj:14)

CDM 到任苍南县龙港镇镇委书记后，开始在龙港这块很小的地盘上，进行了土地、户籍等改革，每一项改革都是向当时的政策发出挑战。他设计的城市日后被命名为“农民城”。

(Aj:1)

B 文本对此作了反诘，重点叙述地方政府的整体推动力量：

《镇志》将1984年6月的龙港镇说成“荒僻渔村”，为的是将某人捧为建镇的人物，是造假，抹杀了三年间龙港港区开发和建镇的政府成果……。到1984年除了政策、制度层面的众多突破外，港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交通、商业、邮

电及服务性行业等公共设施。光 82 年冬至 83 年 6 月港区建设中的 37 个国有企业，59 个工程项目，投资 577 万元，已陆续开工。其投资来自国家，包括省交通厅、商业厅和县财政拨款……。

(Bj:15-20)

1984 年建成的“农民城”至今已经走过 26 年，矗立在国道旁的“农民第一城”碑石已经被另一标记——“第一印刷城”——所代替，但两种文本的争斗至今未曾停息。作为亲历者的两类纪实文本，分别于 2008 年改革开放 30 周年纪念中正式出版：A 本为《温州实验——两个人的改革开放史》；B 本名为《中国第一农民城：龙港镇的由来》。它们依然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颂扬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提醒阅听者走入他们各自的故事：一是“农民造城”；二是“政府政绩”。拉回到理论思考上，前者应该与市场转型可能出现“公民社会”的理论相契合；后者则与市场转型期再分配权力持续的理论观点吻合。其实，如同各种理论能够在争辩中共存一样，两文本在竞争（争斗）中建构的不同社会事实也同样可能是共生并存的现象。

#### 四、建镇过程的实证分析

因此，沿两类文本提供的信息，这项研究的理论假设是：改革初期，发生在温州的农民建镇事实，是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强—强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及其目标的达成符合本文提出的“地方社会模型”：强政府与强社会共存。其可能的一个推论是：在中国，改革成功的区域或事件，抑或经济增长迅速的地区，可能是地方政府与民众强强合作的结果。以下我们从行动者、行动者之间关系和制度三层面入手就建镇过程作这一假设的验证。

##### （一）行动者

现在的龙港镇地处苍南之北，鳌江入海口南岸，距温州市区 50 公里，是浙江省距台湾最近的港口之一，总面积 80.7 平方公里，下辖 9 个办事处，107 个行政村和 21 个居民区，约 60 万人口。可是，建镇前这里只有 5 个自然村，人口大约 6000（龙港镇志，1991-2000:38,108）。这样一个人口跃迁，除自然增长率外反映建镇时的人口流入，也具现行动者之涵义。图 1 可知在 1984—2000 年期间龙港镇存在三个人口急增点：(1)1984-1988 年；(2) 1992 年；(3)2000 年。后两增长点——1992 与 2000 年——由行政区划的两次调整造成，属于镇域扩大而致的人口增长（龙港镇志 1991-2000: 110-111），与“农民建镇”无关，故不在研究范围内。1984-1988 年连续 4 年人口增幅在 20%-50%之间，反映建镇人口的集中流入情况；1988 年后明显趋缓，不足 9%，属于人口自然增长情况。依此，本研究跨度设定在 1981—1988 年：1981—1984 年为建镇的筹备阶段；1984—1988 年为镇挂牌后的“农民进城”阶段。此间的行动者自然应该是参与并入住该镇的居民。

问当年的搬迁动因时被访者有一个打比方的说法。

QCH: 改革初期，农民是在黑暗处看到了一盏灯，才来这里的。这盏灯就是政府，农民不可能在一片滩涂上建起一座城市。

（2008. 11. 28. 晚 7:00-10:00 温州龙港镇某咖啡屋访谈）

沿

表 1 1984-2000 年龙港镇人口总数状况

年份	总人口(人)	比上年增长(%)
1984	7812	6.3
1985	15292	48.9
1986	23433	34.8
1987	32593	28.1
1988	41659	21.8
1989	42730	2.5
1990	44534	4
1991	48441	8.1
1992	123679	60.8
1993	127300	2.8
1994	133680	4.8
1995	136510	2

1996	139803	2.3
1997	142774	2.1
1998	146380	2.5
1999	146632	0.18
2000	231278	36.6

### 参考文献

Bell, Daniel, 1996.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Basic Books.

Hobbes, Thoams.1994/1660. *Leviathan*. London: Everyman.

Lin, Nan.1995."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on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301-354.

Locke, John. 1986/1681-1683. *The 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Naughton,Barry. 1995.*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momic Reform 1978-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ughton,Barry. 2004. *Holding China together :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Deng era*.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ughton,Barry.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Nee,Victor.1989."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s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4:663-681.

Nolan,Peter & Dong Fureng, Ed.1990. *Market Forces in China: Competition and Smal*

*Business—The Wenzhou Debate* London and New Jersey : Zed Books Ltd.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i, Jean C. 1986. "Peasant Households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Cadre Control over Agricultural

Inputs." *Modern China* 12:230-50.

Oi, Jean C.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i, Jean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99-126.

Oi, Jean C. 1999a.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i, Jean C. & Andrew G. Walder. (ed.). 1999b.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um, Anthony M., 2001.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Peng, Yusheng. 1992. "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ial

Secto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198-213.

Peng, Yusheng. 2001. "Chines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as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6.

No. 5: 1338-1370..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olanyi, Karl,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eds.). 1957.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Perry, Elizabeth Jean 2007.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China

- Journal,
- Perry, Elizabeth Jean .2008.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orthcoming, November).
- Szelenyi, Ivan.1988.*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Taylor, Charles.1992.*Multiculturalism and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sai, Kellee S., 2007.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der, Andrew.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09-28.
- Walder, Andrew.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263-301.
- Walder, Andrew.2002.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31-253.
- Wank, David L., 1995. "Bureaucratic Patronage and Private Business: 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in Urban China." In Andrew G.Walder.(ed.).*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153-83.

Wank, David L.,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 :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k, David L.,etc.2002.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陈君球等，2000.《开发龙港纪实：龙江港区老同志回忆录》，第一辑（未出版资料）。

邓正来，J.C.亚历山大，2005.《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黑格尔，1982.《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黄宗智主编，2003.《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勇兴，2002.《聚集与扩散：温州建制镇城市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昌平，2002.《我向总理说真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浩然，2003.《龙港发展模式：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新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王汝亮主编，1994.《中国农民第一城》，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吴敬琏，2003.《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朱康对，2003.《来自底层的变革：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龙港镇志编纂委员会，1994.《龙港镇志》，上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龙港镇志编纂委员会，2003.《龙港镇志（1991-2000）》，北京：中华书局。

魏启番主编，2008.《中国第一农民城：龙港镇的由来》，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